



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视角下刑事涉案财物分层证明标准研究

热点聚焦

□ 谢萍

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数量持续增多。刑事涉案财物事实与定罪量刑事实相互交织,笼统的证明机制难以有效应对刑事涉案财物事实的复杂性。对刑事涉案财物的认定与处置,关系定罪量刑的准确性和追赃挽损的实际成效。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尚未对刑事涉案财物的证明机制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多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以是否影响定罪量刑作为区分依据,当涉案财物关系犯罪构成或量刑档次时,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当仅涉及退赔退赃的权属分配时,适用“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另一种观点基于公诉机关的取证优势,建议确立介于刑事证明标准与民事证明标准之间的中间标准。还有一种观点尝试从刑事没收的特别程序中探寻依据,主张参照“高度可能性”的表述确立相应的证明标准。涉案财物证明标准的分歧严重制约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因此,探索建立分层且与诉讼阶段相适应的刑事涉案财物证明机制势在必行。

刑事涉案财物证明标准的规范演进

我国刑事涉案财物的证明标准正经历从依附于定罪量刑,向探索更为精细的判断规则的演进过程,呈现因程序类型而有所差异的特点。普通程序的个别条款关注涉案财物的争议问题,但作为初步回应,尚未构建明确且可操作的证明标准体系。特别程序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证明标准进行积极探索,为证明标准的完善奠定基础。

一、普通程序中证明标准的演进

在普通程序中,涉案财物证明标准长期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对定罪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案外人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案外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通知案外人出庭。经审查,不能确认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不得没

收。”该规定不仅明确了法院对财物权属的审查和案外人的异议权,而且通过“不能确认……的,不得没收”的规定,为普通程序中定罪标准与涉案财物认定标准的区分提供了解释空间,为涉案财物处置的司法实践奠定了基础。

二、特别程序对证明标准的探索

在特别程序中,为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等特殊情形下追缴违法所得的现实需求,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体现了程序正义前提下实体正义与效率价值的兼顾。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六百二十一条规定:“申请没收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应当认定为前款规定的‘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该条引入的“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在语义层级和证明强度方面均区别于普通刑事诉讼证明中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体现了基于诉讼构造变化、举证困难等情况下对证明标准作出的合理调适。

不同证明标准的法理基础与价值权衡

在刑事涉案财物的认定中,证明标准的选择不仅关乎事实查明,更牵涉诉讼目的与价值权衡。为厘清其内在逻辑,从学理分野与法理平衡两个层面展开分析,揭示不同证明标准背后的制度理性与深层考量。

一、不同证明标准的学理分野

在学理层面,“证据确实、充分”以“排除合理怀疑”为内在要求,适用于定罪量刑相关的事实认定。其目的在于以最高程度的确定性,限制国家刑罚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当干预,体现刑事诉讼中最严格的证明标准。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强调事实存在的“高度可能性”,广泛适用于民事诉讼程序,亦延伸至利害关系人就涉案财物提出权属争议的情形。此类场景中,尊重民事权利认定的内在逻辑,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更利于保障利害关系人合法财产权。

二、多元诉讼目的的法理平衡

在法理层面,刑事涉案财物证明标准的分化,体现了刑事诉讼在多元价值之间寻求平衡的内在要求。“证据确实、充分”的法理基础,基于对被告人生命、自由权利等不可恢复的特殊考虑而确立,根植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严格保障。而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到案的特殊情形下,对证明强度作出

合理且适度的调整,体现程序正义在现实情况中的必要弹性。在利害关系人对涉案财物提出权属异议的情形中,本质上是拟接收涉案财物的被害人与利害关系人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刑事诉讼所保护的法益往往具有不可逆性,而民事权属纠纷则多涉及财产性权益,二者在价值位阶与保护方式上存在差异。正因如此,证明标准的选择并非纯粹的技术性安排,而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和维护财产秩序等诉讼目的的综合权衡。

案外人异议下分层证明标准的具

体构建

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当利害关系人提出权属异议时,既要兼顾刑事追赃挽损,又要保护合法的民事财产权益。为妥善解决此类问题,有必要构建分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依据证明对象的差异,将涉案财物认定区分为“性质认定”与“权属认定”两个维度,并据此配置差异化的证明标准。

一、性质认定: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标准

对刑事涉案财物“涉赃”性质的认定,关系定罪量刑,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并由公诉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具体而言,当利害关系人对作为犯罪工具的涉案财物主张权利并提出购买凭证、支付记录等系列证据证明其权属,从而形成合理怀疑时,公诉机关通过补充举证、重新核查证据链或必要时启动补充侦查等方式履行证明责任,以排除合理怀疑。例如,张三在实施盗窃时使用的撬棍,若李四主张该撬棍为其所有,并提供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对该撬棍作为犯罪工具形成合理怀疑,同样,在涉案财物本身的价值数额作为构成犯罪或升格量刑关键因素的情形下,例如,张三诈骗李四4万元,而当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为3万元,对“涉赃”性质的认定亦应严格遵循“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因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有效异议可能直接影响入罪条件的成立。

二、权属认定:以“高度盖然性”为基准的民事标准

在涉案财物的“涉赃”争议已确定排除,仅在退赔阶段出现多个主体主张权利时,基于纠纷的民事属性,应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由各方案外人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例如,在张三盗窃金饰,将涉案财物返还金店时,若案外人王五主张对该金



饰享有所有权,则王五与金店之间形成民事权属争议。在此情况下,王五适用的证明标准为民事诉讼中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诉讼构造也相应转为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法院居中裁判的民事诉讼模式。这种安排尊重了民事权利认定的内在逻辑,高效、合理地确定财产返还对象,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三、复合争议:分层分阶段的动态证明体系

实践中更为复杂的是性质与权属交织的复合型争议。例如,在开设赌场案中,利害关系人李四主张被冻结的账户资金系其合法所得。对此,宜采用分层分阶段的动态证明程序:第一阶段,由公诉机关对财物属于“违法所得”承担证明责任,并需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第二阶段,利害关系人李四提出证据使法官对财物的“涉赃性”产生合理怀疑;第三阶段,证明责任再次回到公诉机关,需要提出更有力的证据以排除此合理怀疑。上述动态证明体系既确保了刑事证明的严谨性,也为利害关系人提供了有效的财产权利救济途径。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前沿关注

□ 聂楚涵

随着金融科技与跨境业务的深度融合,新型隐性金融职务犯罪的呈现隐蔽化、跨区域、技术化特征,传统监管手段面临时空阻隔与证据穿透难题。笔者立足“时空整合”治理理念,通过法治素养渗透、跨境联防、科技合规等维度构建协同治理体系,旨在突破现有执法协作壁垒,为健全金融法治防线提供路径支持。

法治素养与金融合规能力的融合培育

在法治素养与金融合规能力的融合培育中,构建“三维渗透式”体系。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为基准,将监管政策转化为合规库。针对数字支付、跨境资管等领域,通过模拟监管问询等场景,培养条件反射式合规判断力。实务层面采用法治微创手术模式,组建法治诊疗团队对智能投顾、区块链资产等创新业务开展合规解剖,通过还原典型案例,制作金融创新合规边界图谱,将法律条文转化为具象操作禁区。现阶段重点探索法治压力测试机制,要求金融机构对新产品进行穿透式法律评估,形成合规健康度体检表,并建立法治能力动态档案,将从业人员在模拟跨境协查、监管问询中的表现纳入职业晋升通道,实现法治素养与职业发展的实质性挂钩。

跨境法律实践与风险防控的实战赋能

在跨境金融犯罪治理中,构建“三层防火墙”实战体系。设立法律侦察哨,针对虚拟货币跨境流动等新型犯罪载体,开发穿透式监管操作手册,训练从业人员掌握链上资金追踪与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报文核验技术。模拟海外司法管辖区证据冲突场景提升域外取证能力。实务层面推行法治靶向训练,将涉案资金嵌套手法拆解为合规审查节点,形成跨境资金流法律风险评估矩阵,组建法律攻坚组对自贸试验区复杂交易开展合规压力测试。现阶段重点推进法治镜像演练,在前海、临港等试验区设立涉外法治实验室,模拟不同法系监管问询,开发法律导航系统,通过反复演练形成跨境风险应对的条件反射能力。

法治监督与执法协作的机制化训练

在法治监督与执法协作的机制化训练中,构建“三维联动”实战体系。针对跨境金融犯罪特征,设计“监管—司法—技术”协同作战沙盘,模拟虚拟货币洗钱等新型犯罪场景,通过还原涉案资金跨境流动路径,训练执法人员运用SWIFT报文追踪、区块链取证等技术形成穿透式监管能力。实务层面推行法治熔断机制,在自贸试验区设立监管协作实验室,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压力测试,针对智能合约等创新工具制定跨境监管协作操作指引,明确证据调取等环节衔接标准。现阶段重点强化法治神经末梢建设,在金融机构内部设立合规哨兵岗,建立法治特勤队快速响应机制,对跨境资金异动实施联合研判,形成“监测—预警—处置—反馈”闭环训练体系,使法治监督嵌入金融运行时空网络。

法治科技与数据合规的复合能力建构

在法治科技与数据合规的复合能力建构中,打造“技术—法律”双螺旋赋能体系。针对虚拟货币洗钱、智能合约漏洞等新型犯罪手法,开发合规算法沙盘,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转化为可执行的代码规则。通过模拟跨境数据流动场景,训练从业人员运用区块链存证、隐私计算等技术,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监管穿透。实务层面推行法治代码审查机制,要求金融科技产品上线前进行法律合规性压力测试,重点检测算法歧视、数据泄露等风险。组建由技术专家、法律顾问构成的法治特战队,对DeFi平台、元宇宙金融等创新领域开展穿透式合规评估,形成金融科技合规操作指南。现阶段重点建设法治数据中台,整合反洗钱、税务稽查等多维度数据,构建异常交易监测模型。通过法治红蓝对抗演练,持续优化算法识别精度,使数据合规能力真正融入金融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

法治成效评估与人才反馈的闭环设计

在法治成效评估与人才反馈的闭环设计中,构建“三维动态校准”机制。针对跨境金融犯罪治理特征,建立法治效能雷达图,将监管穿透力、执法协同度、风险预警率等指标转化为可量化评估维度。通过模拟虚拟货币洗钱、离岸资产隐匿等新型犯罪场景,对执法人员的证据调取、法律适用能力进行实战化考核,形成法治能力动态画像。实务层面推行法治反馈熔断制度,在自贸试验区设立法治纠偏实验室,对执法偏差案例开展逆向推演。针对智能合约等创新领域,组织技术专家与法律顾问组成法治诊断团队,通过红蓝对抗演练持续优化执法策略。建立法治人才成长档案,将跨境协查、涉外诉讼等实战表现纳入晋升通道,形成“评估—反馈—改进—提升”的闭环赋能体系,使法治成效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通过上述策略,涉外法治人才将兼具金融监管的宏观视野、跨境取证的微观技能、科技合规的创新思维,成为穿透隐性犯罪壁垒的“法治尖兵”。

(作者单位: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

前沿观点

□ 戚玉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平台劳动者规模日益庞大,却存在社保参与率和参保意愿低的情况。国家社保制度承担着防范风险,再分配和维护社会公平等多种功能,不仅是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法律保障,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政府多次强调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而平台劳动者以灵活、自主的工作形式往往游离于社保制度边缘,面临比传统劳动关系更大的风险。新就业形态的社保难题暴露了制度供给不足,现有的社会保障模式都需要调整设计,以解决当前平台劳动者社保面临的法律定位、劳动关系认定、缴费机制等核心难题。

平台劳动者社保的法律定位

从法理基础来讲,劳动者享有适当社会保障是现代法治国家基本的正义要求。不管劳动形式发生何种变化,劳动者的劳动权及其派生的社保权益都应获得充分而平等的对待,不应因就业形态变革造成新的社会分层和福利鸿沟。我国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将劳动者社保的法律定位难题,但平台劳动者的社保依然面临法律定位难题,并且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相关制度供给不足问题。

现行劳动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基于传统就业形式设计,高度依赖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明确的劳动关系,形成社保关系与劳动关系的捆绑。我国社保主要分为职工社保和居民社保,社保法的重点是调整用人单位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基于劳动关系的职工社保具有强制性,居民社保以自愿参保为主。灵活就业人员则需视情况而定,未明确规定。在传统劳动关系和社保制度框架下,法律定位模糊造成平台劳动者社保困局的实际境况,平台企业往往通过各种方式规避劳动关系的确认和缴纳社保的义务。若纳入职工社保,平台企业需要共同承担社保义务。若纳入居民社保,则无法体现其劳动属性和社会风险特征。个人身份缴费,又负

担过重,这是平台劳动者社保参与率和参保意愿低的主要原因。

平台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用工多样性显著区别于传统企业,具有典型数字经济特征。而现行法律滞后于实践发展,尚未明确涉及新就业形态的重要法律概念以及平台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关系。世界各国对新就业形态的认定及社保覆盖面也存在巨大差异,如葡萄牙、克罗地亚认定为有条件的雇佣关系,德国提出“类雇员”的概念,美国视为自雇人员,意大利定义为依附性自雇就业等。多数国家未能明确,将其归为第三类雇佣形式。我国2021年也提出“不完全劳动关系”概念,视为一种中间型的用工模式。由是,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用工关系性质的确认,是解决法律定位模糊的关键,需要及时修订相关法律,丰富制度供给,为新型用工关系提供权威性、一致性的法律依据。

平台与劳动者关系认定

现行社保法和劳动法都是基于“用人单位—员工”二元结构的传统劳动关系设计,具有典型的工业经济特征。这种二元结构展现了清晰而稳定的劳动关系,用人单位管理员工、支付报酬并承担法律责任,员工提供劳动,接受管理并享有法定权利。其本质特征是从属性,包括人格、经济和组织上的从属性,人格从属性是核心和基础。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的用工形式呈现出有别于传统劳动关系的新颖性和多样性,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地点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与平台的关系没有传统二元结构那样直接和密切,为规避传统劳动关系的定性和劳动法的约束,以减少法律责任和降低成本,平台企业往往采用合作、承揽、外包、分包等方式,将自身定位为技术中介而非雇主,将劳动者定义为承揽人或合作者。去劳动关系化的举措进一步模糊了平台与劳动者关系的法律定位,将法律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劳动者社保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平台劳动者身份认定和权益保护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各国司法实践也未形成一致的判定标准。

社保法和劳动法以公法手段作用于私法领域,干预劳动关系的,对劳动者易于倾斜保护。平台与劳动者关系的认定不应局限于工业经济时代用工形

式,但仍可遵循从属性特征,因为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交换本质未变,仍是以出卖劳动力换取报酬。人格从属性方面,算法控制技术手段替代了人为管理,更隐蔽也更强大地将劳动自主性严格限制在派单逻辑、路线规划、时间限制、奖惩机制等算法框架内。经济从属性方面,劳动者主要收入依赖平台,缺少议价能力。组织从属性方面,劳动者接受平台管理,其劳动是平台业务组成部分。技术改进了管理过程,提高了管理效率,但劳动关系的从属性本质未变。因此,需严格区分雇佣和业务外包,并以工作时间和收入划分不同类型的平台劳动者,防止变相掩盖劳动关系,细化和落实《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切实依法保护劳动者权益。

社保缴费机制

平台与劳动者关系尚无法律法规予以明确,司法实践出现不同判定结果,导致多数平台劳动者因劳动关系未定无法参加职工社保,参加则需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实际结果。缴费主体的规定是参保率和参保意愿低的主要原因,因工作和收入不稳定,缴费标准和连续性也是重要原因。

平台劳动者日均工作时长长,且工作风险较大,依法理基础,理应获得参加职工社保的法律保障。职工社保由用人单位与个人按比例缴费,无劳动关系则劳动者自愿缴费。因此,需要明确平台与劳动者的关系,以法律形式确认是否属于劳动关系或其他关系。强化以用工事实认定劳动关系的原则,明确和禁止平台企业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社保责任等长期损害劳动者权益和社保制度公平性等违法行为。平台企业应优化经营管理,而非压低人力成本。以劳动者损失换取利润,进行低价竞争,既违法又不利于市场良性发展。

在分类明确平台与劳动者关系的同时,还需通过弹性机制化解缴费标准和连续性过于刚性的问题。缴费标准刚性体现在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当真实收入低于缴费基数会增加劳动者和平台支出,基于真实收入动态调整缴费基数可减轻参保负担,提高参保率和持续缴费能力;职工社保以用人单位为载体,社保支出占用人成本近40%,个人自缴参照职



工社保。高额负担抑制了平台与劳动者参保意愿和参保率,可依收入建立多层次弹性缴费比例。连续性刚性体现在缴费年限和社保账号绑定:平台劳动者流动性较高,收入缺乏持续性增长机制,应放宽缴费年限,建立灵活缴费机制。例如,按单或按年收入可帮助更多劳动者参保;实现社保数据跨组织、跨区域共享,增强社保账户可携带性,可减少断缴现象。

综上所述,现行社保法和劳动法滞后于用工形式的变化,依法解决平台劳动者社保难题需更新法律赋予平台与劳动者关系明确的法律定位,为劳动关系的确认提供法律基础,建立弹性社保缴费机制,以制度柔性适应用工形式的多样性。虽然目前多地已采取放宽户籍限制、缴费基数等灵活措施,但碎片化和地区差异明显,覆盖范围有限,缺乏全国范围的统一标准。因此,迫切需要为破解平台劳动者的社保困局提供法律依据、制度工具和技术支撑。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型隐性金融职务犯罪的『时空整合』治理法治路径

